



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

西域人文学术研究

陈国光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

西域人文学术研究

陈国光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域人文学术研究 / 陈国光著.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1.7

(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

ISBN 978-7-228-14367-2

I. ①西… II. ①陈… III. ①人文科学 - 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2475 号

责任编辑 贺 灵

整体设计 王 洋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991)3652361
印 刷	新疆八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420 千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册

定 价 42.00 元

《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编委会

一、编辑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主任委员：吴福环

副主任委员：阿不都热扎克·铁木尔

委员：苗普生 张运德 阿布都热扎克·沙依木 库兰·尼合买提
刘仲康 潘志平 董兆武 田卫疆 齐清顺 王 宁 马品彦
郭泰山 刘国防 阿不都热依木·哈力克 阿班·毛力提汗
米娜娃·阿不都热依木 白 莉 艾比布拉·阿不都沙拉木
李晓霞 木拉提·黑那亚提 李树辉 宋建华 柴 林

主 编：吴福环

二、办公室组成人员名单

主 任：李行力

成 员：王 磊 古丽巴哈尔

序

哲学社会科学承担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职责。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是人类文明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发展前景美好。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社会快速变迁的今天,新疆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也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新疆社会科学院正式挂牌成立于1981年,30年来,新疆社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新疆改革开放及社会稳定大局,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社会田野调查和系统精专的学术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起,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社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踏遍天山南北、绿洲草原,身影留在农家小院、牧民毡房、工厂车间、学校课堂、兵团连队、军营哨所,查阅和整理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图书档案,撰写调研报告,发表学术论著,领域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新疆历史、社会、政治、法律、经济、民生、民族、宗教、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文化以及新疆周邻的中亚等国际问题。几十年来,这些研究成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脑力劳动,几十年“冷板凳”,几十年“爬格子”;身居陋室,心怀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春蚕吐丝,似蜡烛燃烧。这些正是中国千千万万爱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几十年来,新疆社会科学院几代专家学者出版了数百上千部著作、数万篇论文和研究报告,其中蕴含着他们的心血和赤诚。他们是新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以及改革开放事业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见证人。2008年,新疆社会科学院决定支持和资助院里具有正高职称(研究员、教授)的专家学者每人出版一部文集,先从离退休专家学者做起,逐步扩展至在职者,每人从自己毕生发表的大量论文中精选数十篇代表作,结集成书,经新疆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审核通过后付梓出版。每一部文集都是作者辛勤耕耘的结晶和智慧的阐发。阅读这一部部文集,我们可以看到每位作者的学术历程和进步,也可以从中看到新疆几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历程。这套文库的出版,是多年来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科研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现,是奉献给社会的一批精神财富。同时,这些成果对于年轻研究人员来说,也是一套富具价值的学习资料。

我衷心祝贺这套文库的顺利出版,并祝愿新疆社会科学院不断推出更多更新更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从而为推进新疆的跨越式发展、社会长治久安以及各民族文化和谐作出应有的贡献。

吴福环(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2010年10月10日

前 言

我 1945 年出生于湖南,1968 年从南开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新疆工作,1979 年经全国统考,被录用到新疆社会科学院,曾先后在宗教研究所与院刊编辑部工作,主要从事西域宗教人文学术研究,重点是新疆伊斯兰史的研究,1996 年被评为研究员,2005 年退休。

至今共发表(出版)论文、专著以及其他学术成果百余项(包括合著与集体项目),主要代表作是与哈吉·努尔哈吉合作出版的维吾尔文本《新疆伊斯兰教史》(赛福鼎代序,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 年),此书作为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新疆伊斯兰史专著,填补了以往在该学术领域的空白。

根据《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出版实施的有关规定,现将本人公开发表的有关西域研究的论文遴选 36 篇,并按内容分为若干组,汇编成《西域人文学术研究》一书。

在这些论文中,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世界宗教研究》及其他核心期刊上的有 20 篇,占选入论文全数 50%以上;曾参加自治区前三届社科成果评奖,分别获论文三等奖 1 篇,二等奖 2 篇;在北京和新疆出版纪念我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的有关学术文集中,被选入的论文共 5 篇;被维吾尔文版和哈萨克文版学术期刊翻译转载的论文共 13 篇。

由于本书所选论文是西域宗教人文历史方面的学术研究论文,具有较强的时效性,这不仅有利于增进新疆地区多元文化的历史学术研究,并且对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也具有现实意义。而对西域宗教,特别是对西域伊斯兰教感兴趣的读者来说,本书也有其可读性,如有关伊斯兰史研究领

域的论文,几乎涵盖了古代新疆地区从伊斯兰教传入之后,与之相关的各方面内容,阅览这些论文,对西域伊斯兰史就能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

陈国光

2010年12月9日

目 录

序	(1)
前言	(1)
佛教与西域文化	(1)
释“和尚”——兼谈中印文化交流初期西域佛教的作用	(4)
藏传佛教(喇嘛教)在新疆的早期传播	(9)
准噶尔时期的黄教寺庙	(17)
西蒙古佛教经济的兴衰	(24)
新疆伊斯兰教发展历史概述	(37)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的时间问题	(51)
伊斯兰教在吐鲁番地区的传播(公元 10—15 世纪)	(61)
西辽统治者与西域地方伊斯兰政权	(72)
蒙、元统治者与西域穆斯林	(79)
论牙剌洼赤与马思忽惕	
——蒙古统治时期的两位西域穆斯林政治家	(93)
叶尔羌汗国政教关系的演变	(105)
论《幻影》一文中的幻影	
——对《西域史上的一个幻影》一文的几点质疑	(117)
清政府统一新疆前对待伊斯兰宗教民族问题的态度与政策	(125)
清政府对新疆伊斯兰教的政策	(134)
“回回二十五世到中原”考	
——关于新疆伊斯兰教神秘主义在内地传布问题	(141)

依禅派考论	(155)
新疆伊斯兰教史上的伊斯哈克耶	
——兼论我国哲合林耶门宦的来源	(167)
穆罕默德·谢里甫及其乌瓦伊西耶教团	(180)
略论伊玛目热巴尼及其苏非学派	(193)
中亚纳合西班底教团与我国新疆和卓、西北门宦	(203)
论清代新疆与祖国内地伊斯兰教的联系和交往	(217)
对哈特曼调查经典目录的释注与证补	(228)
清朝统治时期新疆维吾尔地区伊斯兰教的教法问题	(240)
关于清代新疆伊斯兰教民法问题——契约文书探讨	(253)
我国新疆地区历史上伊斯兰法制的兴衰	(267)
对新疆伊斯兰教教育的历史回溯	(278)
伊斯兰教与古代新疆文化	(289)
清代维吾尔族中的伊斯兰教	(301)
清代新疆回民的社会生活	(324)
清代新疆哈萨克族的社会生活	(335)
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宗教信仰述略	(353)
纳赛尔·霍斯罗乌与伊斯兰教在新疆塔吉克族中的传播	(361)
新疆“方神”本是戍边爱国之士——清末新疆方神志文辨析	(373)
新疆宗教古今谈	(382)
新疆的宗教文化	(392)
学术成果目录(选辑)	(402)

佛教与西域文化

在被称为“西域”的古代新疆,佛教的传播与文化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佛教文化中的精华乃是西域文化库藏中的瑰宝。在早期塔里木盆地佛教文化发展时期,从公元前1世纪印度佛教最先输入于阗(和田),到子合(斡句迦)、疏勒(喀什噶尔)、龟兹(库车)、高昌(吐鲁番东南境)诸地渐次佛化,其中于阗、子合所传为大乘佛教,疏勒为小乘佛教,龟兹、高昌则大小(乘)兼备。到公元4至5世纪古代西域佛教进入全盛时代,在塔里木盆地南北交通要道上以于阗和龟兹两地构成两大佛教中心。该时期西域佛学经典的撰述和翻译,不仅使此地成为中印文化的结合地,而且也成为我国佛教的策源地。在于阗曾产生出沙门祇多密(减友)、提云般若(天智)、实叉难陀(学喜)等大乘经师,在疏勒出现了声明(语言学)、训诂学家慧琳,在龟兹亦涌现出著名翻译家鸠摩罗什和佛图舌弥、达磨跋陀(法贤)等大小乘高僧。在丰富的佛教典籍中,方等诸部大乘经典产自于阗、龟兹者比比皆是,而于阗、疏勒、鄯善等地名,也多散见于华严、大集等部经文中。西域成为大乘经典孕育之中心,于阗更不啻为中土大乘佛教之母国。然而在西域影响亦甚深广的小乘佛教也独具特色,大乘佛教普渡众生的博大理想与小乘佛教追求自我解脱的精致处世哲学在西域丝绸之路交相辉映,薰习浸染到社会精神生活的各个层面,随着佛寺、佛塔的兴建,佛洞、佛窟的开凿,建筑学、雕塑、绘画等蓬勃发展起来,印度—希腊艺术的结晶——犍驮罗艺术在西域佛教美术中风靡一时。因讲经说法、弘教布道的需要,在编写佛本生故事基础上形成的佛教文学得以繁荣。在行像浴佛、节庆法会与日常祭祀仪式中的娱神音乐舞蹈,大大活跃了丝绸之路音乐文化,借鉴印度佛曲而创作的西域各地佛乐,以及使用的乐器和编排出的多彩多姿的舞蹈,不仅大量流传到中原内地,有的还远传至东瀛(日本)。以法显、玄奘等大师为代表的无数沙门西行求法与东来译经师的往还,促进了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的广泛交流。随同佛教的传播,印度文化其他方面如天文、历算、因明学(逻辑学)、医

学、艺术以及烧制玻璃、熬糖等工艺同时传入我国,而中国古代科技发明中之蚕丝、造纸、印刷、铸铁、凿井等亦先后输入印度,甚至远传到希腊、罗马。

进入中世纪(公元10世纪)之后,由于伊斯兰教在新疆西部大规模传布扩展,逐渐形成在西域的又一世界宗教文化中心,塔里木盆地佛教文明黯然失色,代之兴起的是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回鹘佛教文化。高昌即喀喇和卓,系车师前部故地,九世纪中叶居于漠北的回鹘部众西迁,打败了8世纪末进据该地区的吐蕃人后,建立起东起河西走廊,西到拜城的回鹘高昌王国,改宗皈依佛教的回鹘人以极度的虔信和热诚将佛教文明重新推向一个空前繁盛的阶段。从考古文化上分析,至今保存下来的佛教遗址,几乎全在新疆东部,而其中又以回鹘时代修建的佛寺和佛窟最多。吐鲁番伯孜克里克千佛洞,鄯善吐峪沟千佛洞等,大多是这个时期开凿的,拜城的克孜尔千佛洞是仅次于敦煌的我国四大石窟之一,保存有近1万平方米壁画,连同库车的库木吐拉千佛洞等石窟,除以前修筑的以外,许多也是在回鹘西迁之后所建。高昌回鹘佛教文化具有两个特色:其一是受华夏文化(包括中土佛教文化)影响,由于高昌自汉代以来即形成了以华夏文化习俗为主体、兼摄各民族文化风习的传统,即使在回鹘统治时期,因国王好佛,人民崇敬三宝(佛、法、僧),仍与中原王朝保持密切交往,由中土来新疆的僧人很多,此时期有不少回鹘文大乘经典与秘密部经典系由汉译佛典重译而来。出生于别失八里(吉木萨尔)的著名回鹘翻译家僧古萨里都统就是从“桃花石语”(汉语)转译《金光明最胜王经》的。而用回鹘文译写的关于玄奘与慧远等汉地高僧的传记无疑更是直接译自中土佛教僧传典籍。其二,高昌回鹘佛教汲取了藏传佛教(喇嘛教)营养,加上回鹘文在传播佛教著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沟通了古代维吾尔文化与藏、蒙文化的交流。在元代,高昌回鹘内附之后,来自此地的乞台萨里、安藏、迦鲁纳答思、阿鲁萨浑里、必兰纳识里、舍兰兰八哈石等学者、高僧、比丘尼在为蒙古统治者传译“蕃字藏经”(即西藏文佛典)方面作出过很大贡献。由元至明,高昌佛教呈现向喇嘛教演化的趋势,这在旧有的西域佛教泯灭、西蒙古喇嘛教兴起之际,起到了桥梁过渡作用。

新疆佛教文化发展到近古时期,由17至18世纪准噶尔蒙古佛教文化所接替。原西蒙古瓦喇部早在元代就接受了喇嘛教,16世纪末期佛教在蒙古民族中复苏之后,1615年西蒙古四卫拉特部奉格鲁宗(黄教)新派为共同信仰,并经大力提倡扶植,使之成为准噶尔政权建立、巩固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为便于弘扬黄教佛法,1648年和硕特部高僧咱雅班第达喇嘛在回鹘式

蒙文基础上创制了托忒蒙古文字,并与其弟子译写了 200 余部经、咒、史、传等藏化佛教典籍,其中包括一部分科学、文学著作,如藏医学名著《居悉》(即《四部医典》)等,同时还用托忒文记录了厄鲁特蒙古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新疆蒙古族人民在准噶尔盆地与伊犁河谷所开创的佛教文化,促进了文学、医学、天文、历法、建筑和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从咱雅班第达时起,西蒙古各部就开始兴修土木结构的喇嘛寺庙,到 1732 年左右,噶尔丹策零在伊犁河畔建立起两座庞大的寺院,河北岸一座名固尔札庙(俗称金顶寺),河南岸一座名海努克庙(俗称银顶寺),两庙“高刹摩霄,金幡耀日,栋薨宏敞,象设庄严”,“庙之宏瞻,遂甲于漠北”。以后两庙历经战乱,已被平毁,但上述记载犹可使人想见昔日伊犁河谷“暮鼓朝螺,梵呗清越”、佛法兴隆的景象。

古代新疆佛教虽曾有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愚弄劳动人民的一面,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历史作用。在新疆无论是古代西域佛教,还是后来的藏传佛教,都是中国佛教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早期的塔里木盆地佛教文化、中世纪高昌回鹘佛教文化、近古时期准噶尔蒙古佛教文化,都对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作出过贡献。认识到这一点,有利于增进新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也有利于从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去看我国改革开放的光明前景。

(原载《新疆艺术》1992 年第 1 期)

释“和尚”

——兼谈中印文化交流初期西域佛教的作用

一

“和尚”(又称“和上”)在汉传佛教中原为对佛教师长的尊称,后来成为对佛教僧人的通称。无论是在我国文化著述中,还是在民间,这一称谓都使用得极其普遍,而且“和尚”之称还东传到朝鲜、日本等国,流布很广。

对“和尚”一词的语源,我国历代佛教学者多有考证,其中以北宋赞宁所论最为确切。在他编撰《宋高僧传·满月传》后的附论里,专门讲到佛经翻译的几种情况,就举“和尚”一词为例证,指出该词在印度称为“邬波陀耶”(upādhyāya),在疏勒(今喀什)称为“鹄社”(Khosha),在于阗(今和田)称为“和尚”(hiarxang)。汉译佛经中的“和尚”不是梵文的直译,而是以古代新疆(即西域)地方民族语言(即所谓“胡语”)为中介,经过重译或亦直亦重的译法翻译过来的。可见,“和尚”一词来源于新疆古代于阗语。

在新疆古鄯善国地境发现的佉卢文书,也有“和尚”一词的记载,如佉卢文书第 511 号关于参加浴佛仪式的祈愿辞就对“有权威的国王、长老及中小和尚”表示了敬意。佉卢文传入于阗地区可能在公元 2 世纪中叶,至公元 3 世纪中叶始通行于鄯善地区,因此可以断定 3 世纪中叶前后,在古代新疆东部的鄯善地区佛教僧团中也使用了“和尚”这个称谓,而且从佉卢文记载来看,当时西域的和尚分大中小三类,相对于中、小和尚的长老自然也就是大和尚了。

差不多在同时,“和尚”之称还流行于塔里木盆地北缘的龟兹(今库车)地区,公元 231 年出生于龟兹帛姓王族的佛图澄就有此称,不过在汉文音译中最初是写为“和上”的。据南朝(梁)慧皎《高僧传》卷九记载,佛图澄于晋怀帝永嘉四年(310 年)来洛阳传教,为石勒所尊信,“有事必咨而后行,号大和上”。石勒死后,石虎对佛图澄更为推崇,下诏称“和上国之大宝”,其荣宠倍

增。佛图澄日常随身弟子数百,前后门徒累计上万,门下所出名僧也有数十人,在他所经历的郡县,兴立佛寺 893 座,是佛教入华以来最高数目。传说佛图澄“神通”广大,善慑人心,“於是国人每共相语:‘莫起恶心,和上知汝’。”由此看来,“和上”之称最初在我国中原地区的流行恐怕主要还是由佛图澄这样的西域高僧传教弘法的巨大影响造成的。

继佛图澄之后又一蜚声中原的龟兹高僧,著名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344—413 年)也有“和上”之称。上引《高僧传》卷二记载,鸠摩罗什年轻时在龟兹广传大乘经论,并化导其师盘陀达多,使之信服。达多于是礼什为师,言:“和上是我大乘师,我是和上小乘师矣。”罗什于公元 401 年到长安译经后,他与弗若多罗合译的《十诵律》中便使用了这个音译词。对“和上”的写法,我国佛教律宗一直坚持使用,但官修正史则改写为“和尚”,如北齐时所撰《魏书·释老志》称佛图澄为“大和尚”,初唐房玄龄撰《晋书·佛图澄传》亦称他为“和尚”,这是我国正史文献中最早使用“和尚”之称的记录。此后中土撰述的佛经也使用此称,如公元 780—800 年完成的敦煌写本《坛经》,就将达摩至慧能六代禅宗祖师均尊称为“和尚”。

二

然而在佛经翻译史上,“和尚”(或“和上”)这个译名曾一再受到批评,如唐道宣《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玄应《一切经音义》、慧苑《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以及《大沙门百一羯磨法》、《秘藏记本》诸书从音与义两方面对“和尚”这个译名进行了驳正。从音的方面来讲,批评者们指出“和尚”这个译词不是“典语”,即不是来自作为佛教圣典用语的“五天雅言”、“中梵本音”,而是“西方世俗语”,于阗、疏勒等地方“讹音”,由于“胡传天语,不得声实,故有讹僻”,“皆于阗等国讹也”。从词义方面来讲,则认为“和尚”系由梵语“乌社”(或“乌邪”、“殍社”)一词转译而来,原是印度对世俗博士(即所谓“俗儒”)的泛称,而不是对佛教师长的专称,对佛教师长的专称乃是“邬波驮耶”(upādhyāya)。另外,以往有人将“和上”解释为“和中最上”,更是“逐字而释,不知音本”,望文生义的说法。玄应《音义》二十三曰:“义释云,知罪知无罪为和上也。”这乃是“和上”一词引申之义,应当说这也正是中土佛教律家坚持使用“和上”之称的依据。佛教经律论三藏中,“律”是专门对出家的比丘、比丘尼制订的禁条,善于背诵、讲解律藏的僧人

被称为律师,律家称师长为“和上”,因为“和上”的含义——知罪知无罪,正是律师的职能。

“和尚”在梵文中的正确原词“upādhyāya”中,“upa”有“近、亲近”之意,“dhyāya”则有“读、诵”之意,鸠摩罗什所译三藏曾将此梵文词意译为“力生”,涵义是佛门弟子依靠师长而道力得以生成。隋代译经师更确切地译为“近诵”或“近读”,唐代则译为“依学”、“依读”。另外,对此词还有“教读”、“亲教”、“亲教师”等意译。不过对意译词中,仍有某些批评意见,如道宣就认为罗什所译“力生”,是“得其远意,失其近语”,而倾向于使用音译。

但对“upādhyāya”一词的汉文音译,情况亦颇复杂,有“拔底耶”、“优婆驮耶”、“邬波陀耶”、“优波那诃”、“优波第耶夜”、“邬波陀耶”、“优波陀诃”、“郁波第耶”、“邬波驮耶”、“坞波陀耶”、“邬婆提耶”、“郁波第耶夜”等多种译写。《百一羯磨》称:“诸经律梵本,皆云邬波驮耶。”《寄归传》也认为:“若依梵本经律之文,咸云邬波驮耶。”在以上各种汉文译写中,“邬波驮耶”至今仍是佛学界公认的标准音译词。

对“和尚”一词的批评和驳正大多集中在唐代。耐人寻味的是,佛经翻译史的实践结果与唐代部分音义学家和译经师的愿望并不相同。梵文词“upādhyāya”的汉文音译和意译最终只是留存于故纸堆里而未能进入实际生活之中。究其原因应当说主要是译词不符合汉语习惯。该词的音译“邬波驮耶”等不仅诘屈聱牙,而且用字冷僻,难以推广。其意译如“近读”、“近诵”、“依学”、“依读”、“亲教”等,在汉语中动词色彩较强,不宜作名词使用。至于译为“亲教师”也还是难以直接表达出佛教师长的神职身份。

与此不同的是,来自古代于阗语的“和尚”这个汉文音译词,虽曾在唐代一再受到批评和驳正,却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不仅在我国官修正史与佛教经籍中得到使用,而且在寺院僧团中受到推广,并由此词而派生出诸如“堂头和尚”(寺院主持)、“传戒和尚”(戒和尚,即传戒师)、“铁棒和尚”(执法僧)等僧职名称。在我国民间,“和尚”这个称谓逐渐涵盖了法师、沙门、比丘、沙弥等称呼。而作为佛教僧人的通称,“和尚”一词在中国各类文化著述,特别是在文学作品中的出现的频次恐怕也是最高的。《水浒传》中豪侠仗义却又醉打山门的鲁智深,其绰号“花和尚”便脍炙人口。而《聊斋志异》中《金和尚》一篇,则以“和样”、“和唱”、“和幛”(钱钟书先生认为“幛”可能是“障”字之讹,即“孽障”之“障”)等谐音对那些假托佛法,以愚编氓,乃至“狗苟钻缘,蝇营淫睹”之徒加以辛辣的嘲讽。

从翻译的角度分析,“和尚”这个译词简朴通俗,易于上口,没有原词中的某些动词色彩,与汉语习惯贴近,适于作为名词使用。虽然在我国古典小说中对那些不遵法规或戒律废弛的和尚不乏嘻笑怒骂的描写,但“和尚”二字本身却是褒而不贬,尊而不卑,体现了佛门师长仁爱慈慧、风德高远,因而为信奉佛教的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过去为求助佛法保佑,以“和尚”之称给小儿取乳名的很多。“和尚”成为佛教出家僧人使用最为广泛的一个专有名称,这个事实是无法逆转的,所以唐以后的佛教学者也就顺其自然了。

三

季羨林先生曾通过一些很有代表性的佛教译词的研究,考证出是经西域地方民族语言间接转译为汉语的。如“佛”、“弥勒”(意译“慈氏”)、“恒”(河)、“须弥”(山)等词不是直接译自印度的梵文或巴利文,而是从吐火罗文转译过来的,从而指出,过去人们发现这些借字的音和梵文不相符合,就武断地说它是“讹”或者是“讹略”,事实上只是来源不同而已。

当然,汉译佛经中的这种借字还有不少,如“沙门”、“沙弥”、“波逸提”(堕罪)、“出家”、“外道”、“灭”等都是来自龟兹语,至于来自于阐语的“和尚”亦属此类例证。

考古发掘证明,公元前1世纪佛教传入西域后,佛经中有不少典籍是先由梵语原本译成于阐语、龟兹语等当地语言的。如在敦煌发现的用古代于阐语抄写的《大乘无量寿经》、《金刚般若经》、《金光明经》、《一百五十颂般若波罗密多经》等,而在新疆库车发现的龟兹语佛典则有《法句经》、《大般涅槃经》、《大颂比喻经》、《悲华经》、《佛德赞叹偈》、《十诵比丘戒本》及其他经典片断。

大批印度佛经经过西域地区学者们的转写或转译而成为“胡本”,不仅因文字的转换而发生某些改动,而且会因译者在学说上师承关系不同而进行修订和补充,很可能有些经典(如《华严》、《大集》等经)的编纂也是在西域进行的,自然有当地佛学者撰述的内容加入其中,从而形成与印度佛学并不完全相同的西域佛学特色。

在中印佛教交通史上,据初步统计,从公元3世纪(260年)至11世纪终,上下八百年间中原各朝佛教僧人赴印度求法者180余人,其中100多人是由陆路经西域往还。从公元147年至836年近七百年间由印度及中亚等